

主编 李天纲
中国国家图书馆藏
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·哲学（第二辑）

社会改造之八大思想家

〔日〕生田长江 本间久雄 著 林本 等译



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
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

主编 李天纲
中国国家图书馆藏
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·哲学（第二辑）

社会改造之八大思想家

〔日〕生田长江〔日〕本间久雄 著 林 本 等译



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
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社会改造之八大思想家/李天纲主编. —上海: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, 2017

(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. 哲学)

ISBN 978-7-5520-1806-6

I. ①社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思想家—生平事迹—世界 IV. ①K81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032183号

社会改造之八大思想家

主 编: 李天纲

编 纂: 赵 炬

责任编辑: 唐云松

特约编辑: 陈宁宁

封面设计: 清 风

策 划: 赵 炬

执 行: 取映文化

加工整理: 嘎 拉 江 岩 牵 牛 莉 娜

责任校对: 笑 然

出版发行: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

上海顺昌路 622 号 邮编 200025

电话总机 021-63315900 销售热线 021-53063735

<http://www.sassp.org.cn> E-mail: sassp@sass.org.cn

排 版: 上海三联读者服务合作公司

印 刷: 常熟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650×900毫米 1/16开

印 张: 18.5

字 数: 240千字

版 次: 2017年4月第1版 2017年4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520-1806-6/K.382

定价: 92.00元 (精装)

民国西学：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

——『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』序

李天纲

继唐代翻译印度佛经之后，二十世纪是中文翻译历史上的第二个高潮时期。来自欧美的『西学』，以巨大的规模涌入中国，参与改变了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，这在人类文明史上也是罕见的。域外知识大规模地输入本土，与当地文化交流信息，激发思想，乃至产生新的理论，全球范围也仅仅发生过有数的那么几次。除了唐代中原人用汉语翻译印度思想之外，公元九、十世纪阿拉伯人翻译希腊文化，有一场著名的『百年翻译运动』之外，还有欧洲十四、十五世纪从阿拉伯、希腊、希伯来等『东方』民族的典籍中翻译古代文献，汇入欧洲文化，史称『文艺复兴』。中国知识分子在二十世纪大量翻译欧美『西学』，可以和以上的几次翻译运动相比拟，称之为『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』、『中国的文艺复兴』并不过分。

运动似乎是突如其来，其实早有前奏。梁启超(1873-1929)在《清代学术概论》中说：『自明末徐光启、李之藻等广译算学、天文、水利诸书，为欧籍入中国之始。』利玛窦(Mateo Ricci, 1552-1610)、徐光启、李之藻等人发动的明末清初天主教翻译运动，比清末的『西学』早了二百多年。梁启超有所不知的是，利、徐、李等人不但翻译了天文、历算等『科学』著作，还翻译了诸如亚里士多德《论灵魂》(《灵言蠡勺》)、《形而上学》(《名理探》)等神学、哲学著作。梁启超称明末翻译为『西学东渐』之始是对的，但他说其『范围亦限于天(文)、(历)算』，则误导了他的学生们一百年，直到今天。

从明末到清末的『西学』翻译只是开始，而且断断续续，并不连贯成为一场『运动』。各种原因导致了『西学』的挫折：被明清易代的战火打断；受清初『中国礼仪之争』的影响；欧洲在1773年禁止了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，以及儒家保守主义思潮在清代的兴起。鸦片战争以后很久，再次翻译『西学』，仍然只在上海和江南地区。从翻译规模来看，以上海为中心的翻译人才、出版机构和发行组织都比明末强大了，影响力却仍然有限。梁启超说：『惟（上海江南）制造局中尚译有科学书二三十种，李善兰、华蘅芳、赵仲涵等任笔受。其人皆学有根底，对于所译之书责任心与兴味皆极浓重，故其成绩略可比明之徐、李。』梁启超对清末翻译的规模估计还是不足，但说『戊戌变法』之前的『西学』翻译只在上海、香港、澳门等地零散从事，影响范围并不及于内地，则是事实。

对明末和清末的『西学』做了简短的回顾之后，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：二十世纪的中文翻译，或曰中华民国时期的『西学』，才是称得上有规模的『翻译运动』。也正是在二十世纪的一百年中，数以千计的『汉译名著』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必读教材。1905年，清朝废除了科举制，新式高等教育以新建『大学堂』的方式举行，而不是原来尝试的利用『书院』系统改造而成。新建的大学、中学，数理化、文史哲、政经法等学科，都采用了翻译作品，甚至还有西文原版教材，于是，中国读书人的思想中又多了一种新的标杆，即在『四书五经』之外，还必须参考一下来自欧美的『西方经典』，甚至到了『言必称希腊、罗马』的程度。

我们在这里说『民国西学』，它的规模超过明末、清末；它的影响遍及沿海、内地；它借助二十世纪的新式教育制度，渗透到中国人的知识体系、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中，这些结论虽然都还需要论证，但从一般直觉来看，是可以成立的。中国二十世纪的启蒙运动，以及『现代化』、『世俗化』、『理性化』，都与『民国西学』的翻译介绍直接有关。然而，『民国西学』到底是一个多大的规模？它是一

个怎样的体系？它们是以什么方式影响了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？这些问题都还没有得到认真研究，我们并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。还有，哪些著作得到了翻译，哪些译者的影响最大？『西学东渐』的代表，明末有徐光启，清末有严复，那『民国西学』的代表作在哪里？这一系列问题我们并不能明确地回答，原因就在我们对民国翻译出版的西学著作并无一个全程的了解，民国翻译的那些哲学、社会科学、人文学科的『西学』著作，束之高阁，已经好多年。

举例来说，1935年，上海生活书店编辑《全国总书目》，『网罗全国新书店、学术机关、文化团体、图书馆、政府机关、研究学会以及个人私家之出版物约二万种』。就是用这三万种新版图书，生活书店编制了一套全新分类，分为：『总类、哲学、社会科学、宗教、自然科学、文艺、语文学、史地、技术知识』。一瞥之下，这个图书分类法比今天的『人大图书分类法』更仔细，因为翻译介绍的思潮、学说、学科、流派更庞大。尽管并没有统一的『社科规划』和『文化战略』，『民国西学』却在『中国的文艺复兴』运动推动下得到了长足发展。查看《全国总书目》（上海，生活书店，1935），在『社会科学·社会学一般·社会主义』的子目录下，列有『社会主义概论、社会主义史、科学的社会主义、无政府主义、基尔特社会主义、乌托邦社会主义、基督教社会主义、议会派社会主义』等；在『社会科学·政治·政体政制』的子目录下，列有『政治制度概论、政治制度史、宪政、民主制、独裁制、联邦制、各种政制评述、各国政制、中国政制、现代政制、中国政制史』等，翻译、研究和出版，真的是与欧美接榫，与世界同步。1911年以后的38年的『民国西学』为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打下了扎实的基础，而我们却长期忽视，不作接续。

编辑出版一套『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』，把中华民国在大陆38年期间翻译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著作重新刊印，对于我们估计、认识和研究『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』、『中国的文艺复兴』，接续当

时学统，无疑是有着重要的意义。1980年代初，上海、北京的学术界以朱维铮、庞朴先生为代表，编辑『中国文化史丛书』，一个宗旨便是接续1930年代商务印书馆王云五主编『中国文化史丛书』，重振旗鼓，『整理国故』，先是恢复，然后才谈得上超越。遗憾的是，最近三十年的『西学』研究却似乎没有采取『接续』民国传统的方法来做，我们急急乎又引进了许多新理论，诸如控制论、信息论、系统论……还有『老三论』、『新三论』、『后现代』、『后殖民』等等新理论，对『民国西学』弃之如敝屣，避之唯恐不及。

民国时期确实没有突出的翻译人物，我们是指像严复那样的学者，单靠『严译八种』的稿酬就能成为商务印书馆大股东，还受邀担任多间大学的校长，几份报刊的主笔。但是，像王造时（1903-1971）先生那样在『西学』翻译领域做出重要贡献，然后借此『西学』，主编报刊、杂志，在『反独裁』、『争民主』和『抗战救国』等舆论中取得重大影响的人物也不在少数。王造时的翻译作品有黑格尔的《历史哲学》、摩瓦特的《近代欧洲外交史》、《现代欧洲外交史》、拉铁耐的《美国外交政策史》、拉斯基的《国家的理论与实际》、《民主政治在危机中》。1931年，王先生曾担任光华大学教授，文学院院长，政治系主任，后来创办了《主张与批评》（1932）、《自由言论》（1933），组织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』（1932）。他在上海舆论界发表宪政、法治、理性的自由主义；他在大学课堂上讲授的则是英国费边社社会主义、工联主义和公有化理论（见王造时著《荒谬集·我们的根本主张》，1935，上海，自由言论社）。非常可惜的是，王造时先生这样复杂、混合而理想主义的政治学理论和实践，在最近三十年的社会科学、人文学科中并无讨论，原因显然是与大家不读，读不到，没有再版其作品有关。

我们说，『民国西学』本来是一个相当完备的知识体系，在经历了巨大的『断裂』之后，学者并没有好好地反省一下，哪些可以继承和发展，哪些应该批判和扬弃。民国时期好多重要的翻译著作，我

们都没有再去翻看，认真比较，仔细理解。『改革、开放』以后，又一次『西学东渐』，大家只是急着去寻找更加新颖的『西学』，用新的取代旧的，从尼采、弗洛伊德……到福柯、德里达……就如同东北谚语讽刺的那样：『熊瞎子掰包谷，掰一个丢一个。』中国学者在『西学』宝库中寻找更新式的装备，在层出不穷的『西学』面前特别害怕落伍。这种心态里有一个幻觉：更新的理论，意味着更确定的真理，因而也能更有效地在中国使用，或者借用，来解决中国的问题。这种实用主义的『西学观』，其实是一种懒惰、被动和浮躁的短视见解，不能积累起一个稍微深厚一点的现代文化。

讨论二十世纪的『西学』，一般是以五四『新青年』来代表，这其实相当偏颇。胡适、陈独秀等人固然在介绍和推广『西学』，倡导『启蒙』时居功至伟，但是『新文化运动』造成不断求新的风气，也使得这一派的『西学』浅尝辄止，比较肤浅，有些做法甚至不能代表『民国西学』。胡适先生回忆他们举办的《新青年》杂志，有一个宗旨是要『输入学理』，即翻译介绍欧洲的社会科学、人文学科知识，他还大致理了一个系统，说『我们的《新青年》杂志，便曾经发行过一期『易卜生专号』，专门介绍这位挪威大戏剧家易卜生，在这期上我写了首篇专论叫《易卜生主义》。《新青年》也曾出过一期『马克思专号』。另一个《新教育月刊》也曾出过一期『杜威专号』。至于对无政府主义、社会主义、共产主义、日耳曼意识形态、盎格鲁·萨克逊思想体系和法兰西哲学等等的输入，也就习以为常了。』（唐德刚编译：《胡适口述自传》，北京，华文出版社，1992年，第191页）。胡适晚年清理的这个翻译目录，就是那一代青年不断寻找『真理』的轨迹。三四十年来，他们从一般的人性论学说，到无政府主义、社会主义、马克思主义；从不列颠宪政学说，到法兰西暴力革命理论、德意志国家主义思想，再到英格兰自由主义主张，大致就是『输入学理』运动中的全部『西学』。

胡适一语道破地说：『这些新观念、新理论之输入，基本上为的是帮助解决我们今日所面临的实际

问题。』胡适并不认为这种『活学活用』、『急用先学』的做法有什么不妥。相反，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接受『西学』的方法论，大多认为翻译为了『救国』，如同进口最新版本的克虏伯大炮能打胜仗，这就是『天经地义』。今天看来，这其实是一种庸俗意义的『实用主义』，是生吞活剥，不加消化，头痛医头，脚痛医脚的简单思维，或曰：是『夺他人之酒杯，浇自己之块垒』。从我们收集整理『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』的情况来看，『民国西学』是一个比北大『启蒙西学』更加完整的知识体系。换句话说，我们认为『五四运动』及其启蒙大众的『西学』并不能够代表二十世纪中国西学翻译运动的全部面貌，在北大的『启蒙西学』之外，还有上海出版界翻译介绍的『民国西学』。或许我们应该把『启蒙西学』纳入『民国西学』体系，『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』才能得到更好的理解。

我们认为：中国二十世纪的西学翻译运动，为汉语世界增加了巨量的知识内容，引进了不同的思维方式，激发了更大的想象空间，这种跨文化交流引起的触动作用才是最为重要的。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变得不古不今，不中不西，并非简单的外来『冲击』所致，而是由形形色色的不同因素综合而成。外来思想中包含的进步观点、立场、方案、主张、主义……具有普世主义的参考价值，但都要在理解、消化、吸收后才能成为汉语语境的一部分，才会有更好的发挥。在这一方面，明末徐光启有一个口号可以参考，那便是『欲求超胜，必须会通；会通之前，必先翻译』。反过来说，『翻译』的目的，是为了中西文化之间的融会贯通，而非搬用；『会通』的目的，不是为了把新旧思想调和成良莠不分，而是一种创新——『超胜』出一种属于全人类的新文明。二十世纪的『民国西学』，是人类新文明的一个环节，值得我们捡起来，重头到底地细加阅读，好好思考。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邀我主编『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』，献弁言于此，是为序。

2016年3月20日，于阳光新景寓所

「日」生田長江「日」本間久雄 著 林 本 等譯

社會改造之八大思想家

中華民國十年九月初版

社會改造之八大思想家目錄

一、	<u>馬克斯</u> Karl Marx.....	一
二、	<u>克羅泡特金</u> Peter Kropotkin.	三五
三、	<u>羅素</u> Bertrand Russel.....	六四
四、	<u>托爾斯泰</u> Leo Tolstoy.	一〇四
五、	<u>穆列斯</u> William Morris.....	一三四
六、	<u>喀賓脫</u> Edward Carpenter.....	一八一
七、	<u>易卜生</u> Henrik Ibsen.....	一二四
八、	<u>愛倫凱</u> Ellen Key.	一五〇

社會改造之八大思想家

馬克思 (Karl Marx)

(一) 科學的社會主義之鼻祖

社會主義底學說是由馬克思集其大成

「馬克思說」現在在人類知識發達史上，頓增一新氣象，傾向他的學說者，逐漸增多了。

美國社會主義者路易蒲敦 (L. Boudin) 論「馬克思說」說：「馬克思說，已早不要奮力的去請求別人承認了，不過要維持那資本論第三卷中底唯一公認學理而已。」——這句話，真說得不錯。高子基 (Karl Kautsky) 說：「馬克思說」底朽廢時，就是那實行家底出現時。」婆爾華善兀安 (Paul Weizengluen) 博士說：「馬克思底危機，就是社會科學全體底危機。」這樣說來，馬克思說底

本壘，已早成爲一儼然不可動底形勢了。馬克思負「科學的社會主義鼻祖」底盛名，係一八一八年五月五日（火曜日）生於德國的最古都市萊因州底特列（Trier）市。當馬克思生時，特列之屬於德國僅四年，當時，過去的影響，尙未消滅。即法蘭西底自由思想，還流布於全市，

然普魯西底支配權確立時，其政府就詭計百出，釀成愛國底新精神，和「以反抗革命爲目的所成立的神聖同盟」相結合，去威嚇特列市，

他的父親，是猶太人，精通法律，在特列市中，極有勢力；而其思想，則很受十八世紀法蘭西自由主義底影響。他（父親）是來布尼之（Leibniz）底學生，而且很崇拜華爾脫（Walter）既欽佩盧梭（Rousseau）更敬慕來興（Tessing）所以，他一方是進取者；一方又是保守者，就是他在哲學上，雖爲一自由主義者，而在政治上，卻是一保守主義者，是一反動主義者。

馬克思底幼年時代，在他的父親膝下，處處事事，都非常幸福。他的父親深

愛他的才能；一面爲他的絕好遊伴，一面就是他的教師。凡自己所研究而有心得的哲學上宗教上以及歷史上底各問題，當馬克思幼年時，就叮嚀詳盡的解說教誨之。後來，使馬克思發生研究哲學的要求者，可說完全是他的父親種根的他父親有一朋友，叫做魯特維亞斯脫亞倫，係普魯士底官吏。馬克思一生中受感化最深者除父親外，以他爲最。他有一女，名衍尼（Jenny Von Westphalen）——後與馬克思結婚，貧困之中，襄助其夫底大事業，爲功不少；而二人在少年時代，已早爲思想的契友了。

馬克思平平安安的在特列高等校卒業後，卽入波昂（Bonn）大學肄業。

他在波昂大學，成績殊遜。因之次年即退校而轉學於柏林大學。他在波昂大學，其成績之所以不良，原因雖不一而足，而其主腦原因，爲戀想衍尼，這是無可諱言的。就是他到了青春時期，對於衍尼，已早非當作普通友人相待遇相交際所能滿足的了。他不久就大膽的把鬱結的胸懷盡吐露於衍尼，而二人卽堅

訂白頭之約，然後來二人之結婚問題上，荆棘橫生，障礙重重，幾乎難達目的。這是什麼緣故呢？因為衍尼的父親，資產殷饒，而馬克思家實遠不相逮；且衍尼美麗無比，求婚者不勝其多，兼之衍尼的父母，料不到馬克思是一如許有望的青年。

一八三六年，馬克思胸中苑結煩悶而入柏林大學了，當時黑格爾（Hegel）底影響，殘留於柏林大學，尚極有勢力，因之全國學生，欲聽此大哲學家底講義，不約而雲集。

馬克思正因戀愛煩送無聊之日，而他心中所切切不忘之事，忽達目的：蓋衍尼的父母，已許他們二人結婚了。然馬克思底苦悶，反益厲害。這是因為當時衍尼和他遠別，他心中殊為焦灼；兼之他寄書與衍尼，她隻字不覆。——但這煩悶不久就消滅了，願戀愛的煩悶，雖幸而消去，而新精神的煩悶，即相繼襲來，他入學後的第一學期，即讀大名鼎鼎的法學家育漢哥曲里普哈納克基斯所著之

書，繼續研究純理哲學，三百頁「實證論」論文，亦於是時起草；他想獨自創作一新哲學組織。當時他研究高等數學，更熟讀關於德國底歷史，藝術，及文學種種著作。——然此後他的心中，屢次懷着做大詩人或大劇作家底希望。

「詩是宇宙底中心」——這一個思想，深印他的腦海。然僅此一點，到底不能束縛大思想家底青年時代。

馬克思不久投身於黑格爾底青年學徒羣中，他的智識活動上，忽得一新出發點。在某方面看起來，黑格爾哲學是當時革命底最強呼聲。然他的學說，那皮相的王權擁護者，常認為一種保守主義。

他有一句有名格言說：「現在的一切事物，都是有道理的；有道理的事物就是現在的事物」——這一句話，威廉三世以及他的部下都視為保守主義底辯護符。然黑格爾之所謂道理的意味，並不讚賞那存在。他的真意是主張在必要時間內是合理的。一個不合理的政府得以繼續的存在者，是因國民底過誤。

而成的。而那國民底過誤，就是「以那政府爲必要」之謂。

黑格爾哲學，承認進步發展底歷史過程爲不可避的事情。就是在某時代，雖認爲必要的東西，至其次一時代，或竟全無用處而失其實現性。其他一方面，則即發生一新實現來。所以曾在歷史上所實現的一切事情，勢不能免於煙消雲散的；曾認爲合理者，亦勢難免扞格不入之處。由是推之，真理決非一定不變之物了。真理並不是智識的絕對總量，實在是生長不息的東西。一時代底真理，即那一時代底智識總量，在智識更多底他時代觀之，並不是完全的真理。我們如要知道黑格爾哲學裏所貢獻的重要革命思想，則非詳細明瞭當時哲學界底情勢不爲功。他在哲學上所下的判斷，即他在歷史上所認的結果。他一方否認絕對真理，他方就否認「歷史上絕對完成的終局。」——然據他所說，歷史發達的過程底後面，却有絕對的理性在。換言之，就是有神底表現。對於黑格爾底「夢幻的唯心論」，他的青年門生，大起反運動。——此時馬克思和他的先輩婆